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
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內蒙古寧亥革命史料

內蒙古辛亥革命史料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
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61年·呼和浩特

出版說明

五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它摧毁了在我国繼續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由于领导集团的妥协性，沒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次革命包含着丰富的內容和深刻的經驗教訓，很值得我們好好研究。广泛发动老人們，把他們在辛亥革命时期亲見、亲聞、亲知的史料記錄下来，以充实和丰富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資料，這是一項具有重要意义的創舉。为此，本社出版內蒙古政协文史資料研究委員会征得的这15篇回忆录，期为研究者提供一点方便。由于各人觀点不同，見聞有限，材料可能互有出入，也可能有传聞失实、分析欠当之处，本社概存其本来面目，未敢遽改；至于运用馬克思主义的觀点方法，进行分析批判，考其得失，辨其真伪等等工作，还有待史学工作者們来做。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1961年12月

目 录

- 略談辛亥革命前后的家乡旧事……………荣 祥 (1)
辛亥包、薩革命經過……………巴靖远、刘映元、李秉智 (20)
辛亥丰鎮起义紀实……………崔毓珍、仇曾武、张愷然 (36)
辛亥闔錫山民軍在托克托……………李忠孚、閻秉乾 (47)
辛亥革命与綏远特別区的划設……………于存灝 (52)
刀什尔战役紀略……………任秉鈞 (57)
先父子衡先生参加辛亥革命事略……………經革陈 (61)
我所了解的云亭先生辛亥革命事略……………經革陈 (68)
回忆辛亥革命……………博彥滿都 (74)
辛亥革命的点滴聞見和对我的影响……………王宗洛 (77)
辛亥革命时期回忆录……………吳恩和 (80)
辛亥革命的点滴回忆……………李世杰 (88)
辛亥革命时期的李岐山……………李居义 (92)
辛亥太原起义的回忆……………郭子章 (98)
辛亥革命时期內蒙古喇嘛教
 一般情况……………活佛 色令旺宝、莫尔根葛根 (102)

略談辛亥革命前后的家乡旧事

榮 祥

(一) 辛亥年的归綏官僚陣容

辛亥年我刚十八岁，在“归綏中学堂”（这是前清的旧名称）肄业。这是“归綏道”境内唯一的一座中等学堂，是由“古丰学院”改建的。当时我虽然年轻，但是綏远、归化两城的官僚陣容，已能約略記憶。第一个封建大官是綏远将军，按照清朝的制度，他的权力是：調遣宣（宣化）大（大同）二鎮，节制沿边道厅。这在軍事和政治上是一个权威很大的大将军。辛亥年担任这一职位的是一个年逾七旬的滿洲老人，名叫坤岫。他在清末是循資格起家的不著名人物，清廷派他来綏远，也只为他是个老实不生事的人而已。第二个封建大官是鎮守归化城副都統，这是一个單純監督土默特旗事务的二品官。辛亥年担任这一职位的虽然是个壮年滿洲人，但却带有輕微的精神病。他名叫麟寿，属員們背地称他为“麟疯子”。据说他是閩浙总督松寿的胞弟，是个世家紳子弟。第三个封建大官是归綏兵备道，这是一个监察各厅兼管关税和学务并指揮巡防队的有权官員。辛亥年担任这一职位的是一个少壮滿洲人，他名叫咸麟，字泽山，据说他是被同盟會員徐錫麟刺死的安徽巡撫恩銘的儿子，是个怯弱的

少爷。以上三大員的職責虽各不相同，但却都是执行清朝对边疆統治权的有力人物。只是在辛亥年担任这三个要职的人，本領有限，除深居簡出，尸位看門之外，都不能有所作为。这也是当时清政府腐敗衰朽在这一个角落的写照。

(二) 武昌起义前后的归綏情况

在武昌起义以前，我們家乡的士大夫之間已經知道清廷派出的欽差大臣端方在川途中被护送他的湖北新軍譁变杀死。这个消息使归綏两城的大官們除受到一次迅雷裏頂的震惊以外，同时也深深地感觉到时局的紧张气氛是越来越咄咄逼人了。这是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不仅宦海中群情沸騰，就是城乡民众中也窃窃私議，謠言峰起，都認為震撼皇帝宝座的暴雨就要到来了。果然，到了旧历八月十九日，湖北新軍在同盟會員黃興、黎元洪等人的領導下在武昌城起义了。他們的主张是：打倒帝制、建立共和。这个駭人的消息，不到几天就传到塞北，跟着就有各省地方紛起响应的消息也在報紙上不斷刊出。这就使群情更加动荡，而將軍、都統、道台三位封疆大員也越发亡魂丧胆，惊惶失措了。道台咸麟改換服装，头戴白毡帽，身穿一件灰色粗布半截袍，腰勒布条，形状活象一个口里来的卖花生和山里紅的小販。每天夜里不敢睡觉，只在署后花园里作惴惴不安的躊躇。到天明才敢和衣假寐。公事都交給他的“师爷”們去办。他的唯一愿望是盼得时局稍稳，便可解組还家。至于那位副都統麟壽則駭怕得更厉害，把署后的住宅門加上鎖，除他的家属以外不接見任何人。他的最后愿望大概和咸麟一样。將軍坤岫虽然是个老实人，但毕竟年高，更事多，比他那两位后輩，都統、道台要稍胜一筹。同时也因为他是地方軍政的最高长

官，时局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候，他的职责是非硬着头皮拿主意不行。所以当时都统、道台所管事情都由各机关直接向将军请示。

到旧历九月上旬，山西太原的新军也响应武昌起义了。到九月下旬，驻扎在归绥“营房道”的外八旗巡防队也突然暴动起来。他们暴动在夜間，正是全城居民深入睡乡之时。他们原打算用放火惊动居民，把煤油泼在礼拜寺巷清真大寺的门扇门栏和木栅上，因天气已经寒冷，没有燃着。遂放了很少的几声步枪就往山后撤退了。天明后，这件事不半日而传遍全城。人们都说归化城是“福地”；又说归化城召庙多，有神佛保佑，决不能遭劫。这是封建神权社会应有的说法，倒也不足为奇。下午坤岫就传諭新城满洲诸协领和土默特旗各家参领派兵到巡防队营盘搬运库存武器。因巡防队走时只带了士兵们自用的枪，对库存未开箱的汉阳造马步枪五百余支并没动，遗留的子弹也不少，完全由满洲八旗右司和土默特旗兵司瓜分运走。可见巡防队的暴动是事出仓猝，没有什么精密革命计划的。他们于旧历十月从山后绕道进入包头镇才打出革命旗号，军官曹富章自称革命军都督，其余几位是副都督。据说当时共有正副都督五、六位。这是因为原驻包头的一部分巡防队与他们合作之后几个军官也要以“在地虎”的资格称都督。为了合作，便只好多设这种职位。兵少官多，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缺点。后来的失败也恰恰是从这一缺点产生的。

包头在那时还是属萨拉齐管辖的一个镇。在巡防队尚未进入包头之前，萨拉齐厅署理通判，人们称为“樊屠家”的樊恩庆已经带了一个亲兵小队先到包头。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布防就被包头巡防队把归绥巡防队接到城里了。樊恩庆知道

用武力打不过这些都督，而用計是可以取胜的。于是乎他就用他那种候补官巴結上司的看家本領来巴結这几位都督。他指天誓日地表示了投降，胁肩詔笑地显示了忠順。并說他本人也是从武职（他精通技击）轉到文班的，因此他和軍人最能合得来。几位都督被他这种投毒的米湯灌昏了，完全相信他是一个忠实的革命伙伴。却不料樊在恭維他們的同时，正暗中布置着收拾他們的場合。未經多日，樊就选定馬号大院为設宴請客之所，把几位都督全数驅来，在酒筵上伏兵突起，实现了樊一网打尽的目的，巡防队兵也跟着瓦解了。这一事件在当时虽好象曇花一現，但它給归綏带来的影响却很不小，革命的声勢从此日益高涨了。

（三）包头鎮事变后的归綏情况

包头鎮的革命嫩芽，虽然被樊恩庆一脚踏煞了，可是綏远將軍坤岫并不認為塞北的局面从此便能安稳下来。因为他已經知道山西的革命力量被張錫鑾击败后有北出口外的趋势，清政府也給他指明这一点，并命令他以全力守住归綏以保北京的右侧背。因此經常有他的传諭，給地方官員和紳商們打气，叫大家多想办法巩固城防。这时滿洲步營已开往薩拉齐厅，留在归綏的只有土默特旗的步、騎两營，全數兵額不足八百人，力量显得有些单薄。坤岫就邀請土默特旗兵司关防阿靈阿和和旧城回民乡老白維礼，鼓励他們增練守卫队給原有陸軍做助手。二人奉命后，不到半个月就把蒙古和回民守卫队編組完成，两个队每队二百人。蒙古队由土旗前鋒校舒敏泰率領，回民队由回民公推白維礼率領。他們的主要任务是白日查街，夜里巡更。武器是老毛瑟和砸銅帽儿洋枪，还有一部分二人抬。这种队伍只能給官僚、財主們壮壮胆子

而已，根本不能打仗。除此以外，坤岫又从官籍中起用了旧巡防队统领譚永发（譚是在貽谷呈务大参案中被牵连革职的），教他收集驻各厅未譚变的巡防队协助陆军守城。譚是湘军出身的湖北老军官，对于复职带兵这件事是日夜祷祝而求之不得的，怎能不欢欣鼓舞呢？所以譚的队伍也很快就集合起来了。这便是包头镇事变后归绥新增军事力量的大概情况。与此同时，归绥的文职人员和地方绅士也有一些非军事性质的应变活动。首先是道台衙门的秘书长俞翰卿出名约请地方绅、学、商各界知名人士，共同商议，打算成立一个保安会。联名向坤将军递请愿呈文的有方得目，程心之等多人。他们要求把官商生息的学堂基金白银五万两提作保安会经费。这个消息恰好被我们归绥中学堂的监督（那时不叫堂长、也不叫校长）吴启麟老师打听到了。这件事对他的饭碗有被打碎的危险，他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唯一的斗争办法只有发动全堂学生提抗议。可是这时中学的甲、乙两班都已毕业离堂，只剩下丙班和师范班，也因提前放寒假绝大多数学生都回家了。仅有少数外省路远的学生还没有走。我是丙班的班长，又是本归化城人，虽已放假，每天也要到学堂里看看报纸并和留堂的同学说说闲话。有一天吴监督把我唤到他的办公室里，很和气地和我商量这件事的对付办法。我当时年轻气盛，坚决反对提取学堂基金充保安会经费。并主张用全堂学生名义向坤将军提出理由书表示抗议。吴监督立即召集留堂学生说明这种办法，问大家有何意见？我们中、师两班留堂生都表示赞成。吴当然很高兴，就嘱我起草理由书。次日我把稿子交吴审阅。并由我和师范班班长姚玉枢送交将军府的外收发室。隔了一天，吴监督以胜利的表情告我说：“老将军已经答应了咱们的要求，不许别人挪用学堂基金了”。

(四) 归綏滿清部队与北上晋軍之战

归綏部队与北上晋軍之战，是辛亥年塞北的一件大事。

北上晋軍的首領，大家都知道就是投革命之机，以后又叛变革命的臭名远揚的反动头子閻錫山。他从晋西北穿过伊盟准格尔、达拉特两旗界，踏冰渡过黃河进占包头鎮，并改包头为“包东州”。这是旧历十一月的事。这时曹富章等已被“樊屠家”杀害，巡防队的力量已利用不上。閻在包头稍作整顿即东向进攻薩拉齊，一鼓而下，頗称順利。除击走归綏派来的守兵以外，还夺取了吳壩村炮兵陣地的四門山炮。在薩厅释放了“囚犯”，編組了人數頗多的敢死队和決死队。这样做完了增馬添兵的部署之后，即于腊月初率軍东进，准备攻占归綏。初七日进到陶思浩村，探悉前路已有坤岫派出的騎步兵在上、中、下三路布防。这就只好停下来計劃明日出击的事情。

在归綏一方面，自从薩厅失守，駐軍潰退的消息传来以后，將軍坤岫就連夜招集土默特旗各家參領征求他們的意見；打算派土旗兵、騎兩營与譚永发的巡防队同去西路防守。这些老參領和坤岫的利害是一致的，当然同意这样办。坤岫立即发出命令，派土旗步兵营长发义率全营官兵沿大青山南麓出上路；巡防队統領譚永发率全队官兵并配以綏远城炮兵一連出中路；土旗騎兵营长福坦率全营官兵出下路。三路兵必須紧密联系齐头向西挺进，一遇敵軍即奋勇迎头痛击。当腊月初五日中午，三路兵在旧城各大街整队进行，蒙、回两个守卫队也扛着枪跟在后面作了誇張的“揚兵”仪式之后，就出发了。到初七日上午，步兵进入刀什尔村，巡防队和炮兵进入到尔計村，騎兵进入馬群尔村，都探知晋軍已到陶思浩

村，只好暂停下来各自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陌生战役。

当时晋軍和滿清軍两边的情况是这样的：滿清方面的土默特旗步兵营是前綏远將軍貽谷于光緒三十年（1904）奏准清廷新練陸軍两营之一。第一营由八旗滿洲兵編成，第二营由土默特蒙古兵編成。官兵人数都按北洋陸軍章程以足額編制，每营都有五百二十多人。貽谷聘請北洋軍官胡恩光担任两营督練，胡又引荐了一批北洋少壯軍官分任两营教練职务。連年集訓，极为認真，官兵質量比北洋陸軍毫无逊色（民国元年与张紹曾的二十鎮八十团作操演比賽，获得优胜，即是明証）。武器方面，有德国枪（当时称斜五眼枪）三百枝，汉阳造步枪二百二十余支，子弹都很充足。其次是土默特騎兵营，它的成立时期很晚，于武昌起义后才紧急編成。官兵二百七十員名，人人有馬，其体制也是符合北洋陸軍章程的。它虽然是个新营，但兵士都是从步兵营退伍的壯丁，年龄都在三十岁左右。武器初不甚齐楚，后因取得巡防队的庫存枪、弹，就一律换成嶄新汉阳造馬、步两种枪了。至于譚永发所率巡防队残部二百余人，武器原来就是汉阳步枪。就五十年前的塞外軍队來說，这种装备不能算坏。可是北上晋軍却把这三路的战斗力估計过低，尤其是閻錫山的前敵总指揮王家矩認為在薩厅击潰的第一营可能是归綏部队的精銳，精銳尚不堪一击，其余更何足道。因此，他的气很盛，战胜的自信心也很强，大有古人所謂“灭此朝食”的气概。未能深悉敌情，仅凭想当然的估計和勇往直前的意志去作战，这怎能保証不失敗呢？

发义得到了一个住在陶思浩村的退伍兵云有福的情报，知道了革命軍要打刀什尔，夺取枪枝装备徒手的敢死队等情况，就一面給譚永发送信，一面亲自布置陣地。刀什尔村在

晋軍所駐陶思浩村的东北，相隔仅十余里，紧靠大青山，有居民百余户。树木頗多，在村西南有一条从大青山发源的小溪流，土名谷勒畔河，所以人們称晋綏軍这次战役为谷勒畔河之战。发义觀察了地形，料定晋軍必从村西南方进攻，而村西南恰有緊相連接的几个打谷場，都是用荒石块砌成矮牆，約有半人高，这是一种現成的而且是很好的防御工事。发义教兵士把那太高的地方取低些，太低的地方加高些，把牆脚的积雪扫除，鋪了很厚的麦稈，使兵士伏在牆里。这样安排以后，他就把全营兵士分为两批，輪流替換埋伏，監視敌人。并一再告誡他們，沒有命令，絕對不許擅自开枪。

前半夜，陣地上沒有发生任何情况。后半夜即初八日，在鷄鳴以前也沒有什么动静。到鷄鳴几次以后，发义用馬鞭把抱枪在牆下打盹的兵敲醒，并警告那些班长們說：“拂晓攻击這句話，你們还記得吧，不要叫弟兄們再打盹了”。他說完这话还不到一頓飯的工夫，就隐隐听到人馬的踏雪声从西南方传来。这时风雪已息，曠野如銀，靜夜伏听，入耳漸厉。当晋軍进到谷勒畔河岸就先用山炮向刀什尔村轰击，原想把清兵的火力压住再前进。可是这些炮弹半数打在大青山腰，半数打在村里的西头（居民已避在村东头），沒有一枚击中清兵的陣地。打了一陣炮，不見抵抗，就命敢死队和決死队过河冲锋。这两个队大都是由刚打开薩、包两地监狱放出来的“囚犯”临时組成的。排在前一层的兵有二人抬、砸帽儿枪，老毛瑟等武器，排在后一层的就都是徒手，是給前层作补充的。他們弯着腰进到离刀什尔村不远的地方，后面的冲锋号吹响了，他們喊杀开枪向前冲，并夹杂着喊“交枪”。发义从雪地上已經清楚地看見他們进入步枪有效射程之内，立即高声喊“开枪”！这一下，晋軍的敢死队就牺牲

的很不輕。可是他們人數多又因進入火力圈退不下去，所以臥倒後還堅持戰鬥，使戰爭形成一個不小的膠着狀態。天明的時候，晉軍才把正規步兵投入戰鬥，人數比土旗步兵營約多三倍，以偃月陣形從西南向東北逐步包圍上來。發義看到這種情勢，心中暗暗着急，一面派通訊兵馳往譚永發處請援（這時發義不知騎兵在何村宿營），一面籌劃當前拒敵的辦法。他從望遠鏡里看見晉軍前綫有一個騎黑馬的督戰軍官，飛馳飄忽，以戰刀催督步兵前進。當時戰場上雖然彈雨橫飛，可是這位督戰官却毫不畏怯。因此晉軍的步兵攻勢是節節前進沒有後退的。這時土旗步兵營已全體，連炊事兵都加入戰鬥了，但危急的局面卻絲毫也沒有扭轉。發義急中生智，叫他的傳令兵告訴四個連長，要每連選拔射擊最好的士兵三名，登時到他這裡來。轉瞬間，這精選的十二名士兵都聚在他面前，他就命令他們說：“你們這十二支槍暫不必射擊敵兵，只集中火力瞄準那個騎黑馬的督戰官一齊放射，不要七前八後地亂射擊”。發義這個辦法果然有效，當那位軍官督着步兵湧湧挺進的緊張關頭，這裡的十二支槍同時進發，那位軍官立時落馬，那匹黑馬也象箭一般向南奔去，晉軍步兵的攻勢從此就漸漸松下來了。加以譚永發也由東面趕來令炮兵放了幾聲山炮。福坦的騎兵也辨別着槍聲由下路援應上來。晉軍在總指揮陣亡、敵兵會合的情勢下只好撤退。事後很久，人們才知道這位陣亡的督戰官就是閻錫山的前敵總指揮王家矩，那匹馬是薩廝葫蘆頭村蒙古伍海的名馬“黑老虎”。王家矩死時頭上中兩彈、身上中兩彈。那馬也身中三彈，跑到二十里外的貢亢梁村才倒斃。

在戰役結束的第二天，土旗步兵都因“歇後怕”而自動地跑回綏。我的一個表兄名叫仁全（他是我祖母的侄孫，

家住上达賴村)背着枪跑了一夜半天，沒等回營盤就先到我家飽吃一頓。上面这些戰場事實都是他給先父談而我在旁邊听到的。

(五) 清朝、民國過渡階段的歸綏漫志

閻錫山率部返晉，歸綏的緊張局面也即解除，安然過了一個春節。就是在这个時期，城里突然來了一幫惡客。這幫惡客究竟是些什麼人呢？他們的正式名稱叫作“北洋陸軍第一鎮”。原因是閻錫山出口外的消息一傳到歸綏，坤岫就向北京打電報請求派兵援助。在南北議和情況下，袁世凱當時假不承認閻部是革命軍的借口，就答應派兵助剿。惟千里赴援，勢難朝發夕至，況那時京張鐵路剛從張家口展到柴沟堡，再往西就須起早，所以當晉、綏兩軍战斗時，他們還沒有趕到。戰事結束後，他們就來了。他們一到歸綏，就要給地方“立功”，急忙開往托縣打閻錫山。其實閻已早走，他們只在托城騷擾了居民，訛詐了紳商，完成“立功”任務，就返回歸綏蹲下不走了。他們的統制是何宗蓮，此人沒有來，部隊是由協統李奎元帶來的。他們在歸綏的移迹很多，這幫人大約讓歸綏各界恶心膩胃了一年才撤走。

辛亥年腊月，已經是公元1912年的二月，南北兩政府在和議上已決定廢除帝制，建立共和，合組中華民國統一的新政府。跟着就是隆裕太后代表清廷下詔宣布清帝逊位，袁世凱擔任了臨時大總統。各省都以都督管軍事，民政長管民政，改換了清朝二百多年的舊制度。塞外歸綏兵備道改為觀察使，各撫民理事廳一律改為縣。過了春節便是民國元年即1912年三月（北京新政府已公布用陽曆紀年）。這個時期最突出的社會現象是新官紛紛走馬來上任，舊官都意興蕭然地卷鋪蓋

回家。山西派潘礼彥来做觀察使。此人虽是新官，其实也是旧货，他是閻錫山学生时期的国文教員，年逾花甲，頗会逢迎。又派刘懋賞、刘兆瑞二人来做塞北关的正副監督。刘懋賞是山西派往南京出席和會的代表之一，也是力爭太原暴動是革命行为的辯士。山西給他这个肥缺，当然是为了酬功。刘兆瑞是托县留日本的警官生，他父亲刘汉威是归綏大富商。山西派这位富商子弟来做收稅机关的副座，也許是不无微意吧。另一批新官是各县的知事，其中有的是口外人，也有一部分虽不是口外人而是与口外有連系的新貴。在山西所派新官到任之后，北京所派的新官也接踵而来。接替坤岫綏远將軍职位的名叫張紹曾，他原是“北洋陸軍第十二鎮”的統制。他交出军队来这里做將軍，并不是一种愉快的高升，却頗有踽踽凉凉的情味。原因是：武昌起义后不久，清廷命兵部尙書蔭昌統率北洋各鎮陸軍南下討伐，馮國璋等已出发，張紹曾却从駐地——灤州发出一个通电主张議和。这一行为蔭昌对他非常忌恨。蔭是袁世凱的得意門生，袁的起用是蔭的力保。所以袁当权后，不仅認為張是軍人乱出风头，并認為他有意破坏北洋体系。派他来綏远，便是这一行为的后果。但是新任命发表后，張紹曾却迟迟不来，他要求帶全鎮兵上任，袁政府当然不准，最后只給一团（即步兵第八十团）人送他来綏。其次是接替麟壽鎮守归化城副都統职位的名叫賈賓卿，他原是北洋陸軍退职的一个老协統，人极平和。在任期間，虽沒有好成績，也沒有坏声名，土默特人对他的印象还不错。

地方官員应換的都換了，我的母校也得随時代变迁应一应景。除把大門上的橫匾“归綏中學堂”的“堂”字换成“校”字外，監督的名称也改为校长，其他職名也略有更易。

这时旧监督吳福麟已离职，新校长还没派下来。眼看寒假已满，转瞬就要开学，我們到校同学都急于打听誰来当校长。后来据觀察使署的人說：“校长要由地方各界开会公选，觀察使不派人了”。同學們得到这个消息，立刻召集了一个紧急會議。我們顧慮到地方的老先生們万一給我校选出一位不相宜的人，那时反对就迟了。不若趁早通知他們，要求在公选日准許学生代表參加他們的會議。同學們一致同意这样办，并立即发了通知信。当时我們估計老先生們一定要罵我們荒唐，縱有复信也要教訓我們一頓，不許到会。可是回信却出乎我們意料，他們居然同意我們推三名学生代表到会列席。到开会那天，同學們推我和赵瑞年、楊映林去列席。事情办得很順利，校长和学监都照我們推荐的名单通过了。校长是我們的全能老师代县人张璞字玉初。他是山西大学堂西斋毕业生，凡中学課程不論那一門缺教員，他都能代教，并且教的很好（中英文課皆然）。学监是由英文教員定县人邓书山字酉峰的兼任，其后由王定圻接充。我們这一班是清代的丙班，到这时就改为民国的第一班了。开学前我校又招考了第二第三两班，都在春季始业时上了課。我們的学生生活过得很活泼愉快。可是在官僚群里却逐渐发生了极难調和的磨擦，那是張紹曾与閻錫山的权限之爭，也即是晋綏分治的导火綫。下面我就接着談这一点。

（六）張、閻磨擦及晋、綏分合之爭

張紹曾來綏做將軍的原因，上面已經簡單談过。由于他不甚高兴担任这个职位，所以到任頗迟。他来的时候已是民国元年的十月，原說以一团兵送他，临时也只給了一个混成营，那个八十团是次年蒙边軍事吃緊时才請准調来的。这是

张氏在軍事上的一点不如意处。但这种不如意也仅仅是不如意而已，其关系不大，問題也不算严重。惟就任后使他最感头痛的是民政和財政这个問題无法解决。因归綏地区是隶属于山西的一个道，管这个道的觀察使和道轄十二县的知事，都由太原任命。县里的审判司法事务也連带归山西高等法院管轄。塞北关已由山西派員掌握，各县稅捐机关同样要对太原的上級負責。在这种局面下，张的用人用錢大大地受了限制。张彼时年紀刚过三十几，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北洋系少壮派將領，頗欲有所作为。对于这种“魚网里打拳”的处境怎能长期忍耐呢？所以在民国二年初（即壬子年冬）准备选举众議院議員时，张借各县初选当选人群集归綏的机会，組織了一个“归綏烏伊联合会”，作为官民商量地方事务的集議机关，它只反映各界意見而不起立法作用。因我校已放寒假，宿舍多空，这个会的牌子就暫時挂在我校門口，外县来的會員也大半住在学生宿舍。他們的火食和車馬費都由张氏籌給，生活显得很清閑而优裕。我校一些好詼諧的同学給这个机关起个别名，叫它“归綏烏尹吃喝会”。这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酝酿与山西分治問題。当时的分治愿望本来是打算建省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大事。縱然联合会可以出头說話，假使沒有一篇理由充足的請求建議书，北京政府也斷不会迅速批准。为了把这篇文章写漂亮，张就問地方紳士中誰能承担这一任务，多数人都推荐李景泉先生。张又問誰和李先生最相好，能請他替我們写这篇文章呢？大家又說派武爾功去必能請到。这时李正因竞选众議院議員，辞去薩县知事职务，在归綏閑住。經武爾功奉命劝駕，李也就欣然答应了。又經過几次联合会的秘密討論，提供了意見，李就住在我校的校长小院里，門禁严密，謝絕交际，安心致志地起草这一請愿建